学習時報

第783期
2015年4月20日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
报名题字：江泽民

STUDY TIMES

网址：www.studytimes.cn 周一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37 代号：1-267

重要言论

必须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拿出勇气和魄力，自觉运用改革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不断提高领导、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任务很重，时间很紧。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加大改革方案出台力度，试点工作要抓紧抓实。出台的方案一定要有可操作性，细化改革任务的责任主体、完成时限、考核问责等。改革方案通过后，能公开的要向社会原原本本发布，以利社会共同监督落实。要抓好改革方案的进度统筹、质量统筹、落地统筹，理清各项改革的“联络图”和“关系网”，增强改革的有序性。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外交部部长王毅答本报记者问

高层访谈

□本报记者 李 红 汪 彦

国际关系应依时势而定

记者：王部长您好！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一节点，人们对国际关系会有新的审视和思考。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王毅：国际关系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回顾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历史进程，人类始终在探索着国家间相处之道。

300多年前，随着民族国家兴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诞生。它确立了主权、平等这些重要原则，开创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先河。但这一体系最终没能避免欧洲陷入群雄征战。

200年前，维也纳体系应运而生，根据均势原则对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重新做出安排，维持了欧洲较长时间的和平。但最终导致结盟对抗和军备竞赛，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数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每一段国际关系的形成，每一个国际体系的建立，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必须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完善，否则就会跟不上时代脚步，甚至会失去它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70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硝烟中，各国携手创建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相应国际体系，这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巨大进步，为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建设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70年来，我们的世界总体保持了和平稳定，人类的发展事业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未得到完全遵守，国际关系中各种不公正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近年来，经济低迷、地缘动荡、恐怖危机、文明摩擦等各种乱象此起彼伏，现行国际秩序和体系面临新的挑战，有西方学者甚至惊呼，我们正在走进一个“失序的世界”。

7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才能更好地贯彻和落实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才能更有效维护和发展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近年来，有人提出“霸权稳定论”，主张打造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来统领国际事务；有人提出“全球治理论”，主张各国弱化主权，制定共同的规则来管理世界；有人提出“普世价值论”，主张推广某一种自认为“先进”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来一统天下。

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习近平主席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必将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以合作取代对抗 以共赢取代独占

记者：这个新型国际关系到底新在哪里？为什么这个理念是由中国来提出的？请您给我们详细阐释一下。

王毅：好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型国际关系”，那就是：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空前紧密，利益共生不断深化，各国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相互联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各方都会受到影响。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需要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这是我们面对的国际关系的现实，也是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背景。

中国率先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是偶然掉在我们头上的一个苹果，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中华文明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立身处世之道，至今仍在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境界，“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道德情怀，这些理念与基于人性本恶、物竞天择的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明显不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致力于与各国开展友好合作，既为自身建设添砖加瓦，也为别人发展雪中送炭。

40多年前，5万多名中华儿女来到茫茫非洲草原，用汗水和生命筑成1860多公里长的坦赞铁路，我们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勒紧裤带帮助了一大批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提供了无私的支持。

30多年前，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我们把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优势与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优势结合起来，不断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践行互利共赢的理念，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快速成长为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总之，中国人民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懂得，得道才能多助，合作才能共赢。今天，中国朋友遍天下，隔山距海不能限，中国外交更有信心践行合作共赢，更有能力行稳致远。

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记者：对于如何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我们是否已经有了清晰完整的思路？

王毅：是的，中国自身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现在，我们愿与各国一道，再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如何推进这一目标？习近平主席已经给出了清晰的方向，那就是：我们要把合作共赢的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政治上，我们要树立建设伙伴关系的新思路。传统国际关系中经常看到的现象或是结盟，或是对抗。构建伙伴关系，就是要在上述两者之间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讲的，国与国之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中国承认世界上仍然存在结盟政治的现实，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对外政策的权利，同时，我们更希望各方着眼时代发展潮流，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秉持平等、包容和共赢的理念，努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迄今已同75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我们推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双方更加注重战略沟通，更多聚焦务实合作，更好管控矛盾分歧，这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安定。我们期待习近平主席今秋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结出新的丰硕成果。我们保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运行，两国重大合作项目续有进展，国际战略协作不断加强。我们将中欧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致力于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我们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不断增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更加充实，中拉建立起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的伙伴越来越多。

经济上，我们要开创共同发展的新前景。今年联合国将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千年发展目标提出15年来，基本实现了一半极端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但世界上还有十几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发展不平衡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当今世界诸多矛盾热点的根源所在。我们主张，各国应真正树立起利益共同体意识，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正是秉持着这一理念，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发扬，又是有着巨大现实需求的合作构想，已经得到近60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和优先，契合亚欧大陆的实际需要。仅就亚洲而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亟需升级改造，现有融资机构远远不能满足建设融资需求。有需求就意味着有机遇，潜力可以转化为动力。中国倡议成立注册资本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深受各国欢迎。随着最近许多域外发达国家纷纷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将更具代表性和广泛性。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建好亚投行，用好丝路基金，发挥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等机制平台作用，建设富有生机活力的多条经济走廊。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从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产生广阔辐射效应，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地区热点降温，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欢迎各国、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能参与到具体的合作中来。

（下转第2版）

时势专论

怎样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本报特约评论员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一些人因此对经济前景产生某种不乐观情绪。也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下行不过是经济的周期性反应，待下行周期结束会继续高增长。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我们的观点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而非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新常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达到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从稳增长到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下行始于2011年。2011年初中央提出“稳增长”，当年GDP增长即从上年的10.45%降至9.2%，2012年以来又分别降至7.8%、7.7%、7.4%。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这次经济下行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事实确也如此。2011年政府为了“稳增长”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同时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厉调控，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当然会把经济增长稳下来。

也许人们会问：如果不是政府主动调控，我国经济今天是否仍会高增长？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到2020年保持8%的增速应该不成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前两次金融危机的情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曾有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不能保持8%，甚至会破5%，结果我国经济增长却达到7.8%。有人怀疑中国GDP有水分、不真实。当年朱镕基同志说，增长率是当年GDP与上年GDP的比值，不排除我们的GDP有水分，但水分年年有，只要今年不比往年多，分子分母一约就没水分了，所以我们的增长率是可靠的。无独有偶，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初我国提出要保8%，当时又有人认为保不住，结果却增长了9.2%。

两次金融危机我国都能保持高增长，设想一下，如果最近3年中央仍然希望高增长，我国经济会下行么？应该不会。于是就带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能够高增长，为何中央要提出稳增长？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央2011年提出稳增长，正是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作出的决策。这可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作一深入分析。

从国际方面看，我们面对对外出口和碳排放两大挑战。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得益于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在前30年达到40%，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出口明显受到欧美国家排挤。美国这些年一直逼人民币升值，美其名曰实行中美“贸易再平衡”。其实，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平衡美国的逆差，因为我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美国自己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别的国家进口。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让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涨价，打击我们的出口。2010年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奥巴马政府又加速启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这两个协定的根本用意，就是要全面围堵中国的出口与对外投资。

关于碳排放，去年10月联合国在华盛顿召开气候峰会，张高丽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中国的碳排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5%。之所以作这样的承诺，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大国担当，同时也是大势所趋。早在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峰会上，美国就试图推动建立全球碳排权交易市场，只是由于当时国家间利益摆不平才无果而终。长远看，限制碳排放符合世界各国利益，建立全球碳排权市场是早晚的事。这个市场一旦建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若不将经济稳下来，及早调结构以兑现减排承诺，将来就会成为碳排权的最大买家，而主要卖家则是工业化已经完成的欧美国家。由于碳排权供不应求，定价权在人家手里，到时我们只有挨宰的份。我们消耗大量资源生产商品出口，换回的外汇很可能不够买碳排指标。

从国内方面看，以下三个因素也要求我们稳增长。一是自然资源约束。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可能源消费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却非常高。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量为36.2亿吨标煤，占全球的20%；而单位GDP能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这不仅加大了国内供应短缺，而且给国际供应也造成压力。有个现象尤应注意：近些年我们从国际市场进口资源，结果买啥啥涨。这是危险的警示信号，这种状况如不扭转，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总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二是人口红利消失。我国人口红利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据估计对人均产出贡献在20%以上；第二阶段是2000—2010年，人口红利开始减弱；第三阶段是2011—2050年，人口红利消失并转为负数。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3年下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954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上年又减少371万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155万人；而2020年—2030年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年—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意味着未来我国的人口扶养负担将不断加重。

三是经济基数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增长，2010年GDP已近40万亿，人均GDP也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数如此之大，即便每年再增长1%，所创造的GDP相当于10年前4个百分点的增长。2014年我国GDP是63.65万亿，增长7%，一年净增GDP就有4.46万亿，接近1994年一年的GDP，还超过了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土耳其全年的经济总量。经济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增速都会放缓，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也不例外。

正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把过高的速度稳下来。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并指出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增长动力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新常态。既然已进入经济新常态，我们就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并引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何在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这次经济下行是趋势性的，增长已达极限，没有多少潜力了。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增长潜力，要看这个国家的投资、消费、出口是否还有提升空间。正是从投资、消费、出口看，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到达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先看投资潜力。最近10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稳定在40%以上。投资前景如何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投资更是政府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我国近10年投资率达20%以上，高居世界前列，今后也许我国很难保持20%以上的投资率，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我国的水平并不高。2013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739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905美元。而同期美国是8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大体在6000—7000美元左右。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下转第4版）

认识和驾驭『互联网+』大潮

——中央党校举办『互联网+：信息经济浪潮与机遇』高峰论坛

（文章详见第2版）